

由於兩位大陸背景的海外學人趙毅衡、徐賁的文章(總27期)涉及到對「六四」後大陸學術、文化轉向的評論,引起海內外種種反應,是意料中而又十分自然的事。我們認為,通過這些對話和交流,有利於加深對中國思想現狀和知識份子自身位置的理解。

——編者

中國需要自己的批判學派

讀了第27期趙毅衡、徐賁兩篇文章,頗為贊同,並深感他們所批評的現象,從本質上講,絕不僅限於文壇領域。也許這真是一個「眾聲喧嘩」的「分化的時代」(《原道》第一輯),但我總覺得在那些冷冰冰的「不動感情、不見鋒芒的『專家』文章」和「嚴守『鐵律』卻又口若懸河的研討會」(錢鋼語)背後,有某種軟綿綿的東西在作祟:這就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軟骨症。不能期望每一個學子都成為思想鬥士:但在一個大轉變的年代,一個呼喚思想並為新思想的產生創造了社會條件的年代,卻缺乏一個知識者群體去擔當這項使命,則是中國知識界的悲哀。批判的本來含義乃是對一切現存事物的合理懷疑與理智反思。這裏所以對「一切」兩字打上加重號,是考慮到不少人由於深陷了頗具「中國特色」的學術—政治「遊戲規則」而往往對此大打折扣。

我想舉個現實生活中的事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實來佐證此點。明眼人都能看出,目前大陸政治、經濟失衡狀態下的改革與「漸進式」私有化,最大的犧牲者乃是數千萬國有企業的工人。這不但在於創擬中的新體制未能(至少是忽略了)給過去平均主義年代的勞動支出以合理補償,不但在於各種各樣的「當政者」正在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與各種各樣的「尋租人」瓜分國有財產,而且在於形形色色的「承包制」條件下的工人大眾幾乎無法參與企業的經濟監督,職代會形同虛設,連計劃經濟年代那點兒「經濟民主」全都喪失殆盡。如果加大政治改革力度,上述問題可望有所緩解,但政治本身又遇到了權力網絡與意識形態的多重限制。

以上所列固然可悲,然同樣可悲的是我們的許多「學者」不敢正視、更無勇氣公開提出切近現實的問題。因為他們十分清楚討論此類問題的「臨界點」及其背後隱藏的「陷阱」。要說,也只能轉彎抹角,用「純學術」語言將自己保護得嚴嚴實實。畢竟,經濟學家不如文人學士來得瀟灑,後者可以坐在自己的安樂窩中構想「後現代」。嗚呼!悲乎?!

有鑑於此,中國需要自己的批判學派,這應該被視為一

種時代命令。也正因此,我很欣賞趙、徐二位先生的立場,並願引所有高揚知識份子責任感與使命感、敢於向這樣那樣的「臨界點」挑戰的學界同仁為同道。

張博樹 北京

95.4

多元話語帶來的是「迷失」抑或機會?

趙毅衡的〈「後學」與中國新保守主義〉將近年中國知識界的趨向描述為一個「強大的新保守主義思潮」的出現,而其值得注意之處在於,這一潮流竟常以西方當今激進學說(趙謂之「三後」: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為其理論根據。問題於是成為:究竟是後學「本身」內在地包含保守傾向,還是後學在當今中國被「斷章取義」?對這一重要而困難的問題,顯然不可能有簡單回答。因為「後學」不可能是一個單一的同質性的理論,「中國知識界」亦非一未經分化的整體。

對我來說,在西方「後學」對西方中心的「普遍歷史」觀之質疑、對不可壓縮的文化差異之承認、思考與當代中國思想

對自身文化傳統、文化身分的重新審視、讀解之間，確實存在一複雜的歷史聯繫。這一複雜關係的雙重含義可能在於：這裏既包含着通過西方「他者」（這裏是所謂「後學」話語）而（盲目）回歸傳統文化的可能，亦包含着對於中國文化傳統的積極肯定的可能，而這一肯定必然不是「回歸」一本源的純真的中國文化思想傳統（作者在文末也提到「中國文化批判的主體性建立」）。換言之，這一關係之中既有危險亦有希望。趙毅衡的文章對於這一關係中的危險方面（保守地回歸傳統文化）表示擔憂，因而提請知識界注意。這一提醒當然必要。其文限於篇幅，似仍言猶未盡，但問題已經提得十分明確。我相信此文當會引起更多的討論。

最後附帶說一句，作者將我的〈妄想，自戀，憂鬱與獻身〉列在重寫「知識份子自身的「迷誤」史」作者之中，似與我作文初衷有違。我想探討的與其說是知識份子自身的「迷誤」，不如說是中國現代文化話語內的某些構成性、制約性的「規律」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體現。如果（知識份子）主體性的建立離不開語言／言語與敘事結構，那麼探討知識份子自身的「迷誤」也許可能首先是探討語言的「迷誤」結構。我們不是從來就已「迷失」在語言迷宮之中嗎？這一迷失在當代不是已經由於多種語言（東方／西方）在複雜交織而日甚一日嗎？但是，反過來說，沒有「迷失」的可能性，也就沒有尋到「正路」的可能性。也許西方「後學」作為異質的、多元的話語，正在（又一次）使「中國文

化」迷失，但也在（又一次）為中國文化（在所謂後現代歷史環境）提供創造的機會。這可能是我閱讀趙文的最重要的啟發之一。

伍曉明 英國

95.4.7

虛無主義與理想主義

27期上趙毅衡〈「後學」與中國新保守主義〉一文很有生氣。

涉及後學的提倡與反對之爭，有一個癥結是當代中國的虛無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問題，但兩種旗幟下決不只是兩個陣營。真正的虛無主義只有一種，但理想主義卻可以多樣。至少有新、老理想主義的不同。在支持虛無主義傾向中，有些人其實也是理想主義者，只不過是欣賞它對另一種理想主義的侵蝕而已。至於虛無主義的終極要求也是對自身根基的消融這一點卻暫時管不着。而新老理想主義在具體的內容上可能水火不容，但就其較形而上的層次而言又有相通之處。當虛無主義過份局限時，各種理想主義說不定也有互相靠攏的可能。如果理想主義是一種傳統病的話，虛無主義則是一種現代病，在社會轉型期，究竟是可「以毒攻毒」、還是諸病併發，仍是前景不明的大問題。

陳少明 廣州

95.4.9

「部族化」，無可厚非

貴刊2月號登載趙毅衡先生一文，呈現了中國當代文

化、文學批評思想紛呈的軌迹，令人耳目一新。

誠然，對文化的反思乃見仁見智之事，惟需於「後學」所強調的顛覆氛圍下，批評者如何適度對歷史性的文化運動進行深度探討，免於武斷與偏狹，的確值得深思。

正因為趙先生嚴謹的治學作風，提醒我注意那牽涉「後學」的複雜關係，現就「部族化」議題提供一己之見，以期分辨層層深思。

〈後〉文認為標榜「種族、性別、階級、地區」是文學理論「部族化」的結果，趙質問：這是否是理論思維本身已精疲力盡？還是認為全世界已沒有共同關心的論題？對我而言，「部族化」的說法似乎封殺了理論與批判的視野。

趙將「性別」、「種族」等問題視為「部族化」，此乃無可厚非。到底這樣「部族化」的現象影響了我們甚麼？我總認為背後所透露的意義，並不是隔絕各個族群，而是使個人通過這些特有的族群來理解「自我」。容我大膽假設，人類關懷的終極問題仍是自我一事。這話題不可能萎縮，只會繼續膨脹。作為一個閱讀者，如今也在閱讀作品時溶入自己的主體性，企圖尋找面對差異後的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當幾位男批評家以電視劇《唐明皇》為題，表示此劇展現了女體奇觀，頗有後現代之意時，身為女性批評家的戴錦華卻流露了懷疑的口吻。或許，這個現象也能為「部族化」作個註腳。難

道不是因為戴對「性別」問題的關注，才使得她對於隨時可能消解文化的媒體，秉持着如此不樂觀的評斷呢？而這種自省的本質，不也是趙先生在文末所強調的精英傳統嗎？

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等論述雖非純理論，但它們兼具的美學意識與政治性，恰好賦予了後現代主義的前衛性。雖然理論著述始於西方，但並不表示類似的觀念就不曾在中國三邊閃爍、反省過。在挖掘理論、遊走詮釋之際，似乎對此類別的文學觀點不應急於否定。

卓慧臻 英國
95.4

目光犀利；霧裏看花

徐賁先生的文章目光犀利，切中要害。所謂「第三世界文學批評」，如果光在中／西的二元格局中展開，未免給人遠攻近交的感覺，或許作為一種策略來使用也未嘗不可，但畢竟與「批評」的真義相去甚遠。其實，西方著名的後殖民主義批評家，如巴巴(Homi Bhabha)、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重新探討殖民主體(the colonial subject)和主體發言位置的問題(the questions of enunciation)，意在提醒人們關注「第三世界」本身的「內部殖民」現象。徐賁的文章已將這層意思講得很清楚。

至於趙毅衡的文章，非常巧妙地挪用薩伊德(Edward Said)的「旅行理論」，指出西

方的「激進」理論如何在中國「保守化」，結論自然很機智也很有趣，但未免離中國的批評實踐相去甚遠，把立場非常不同的人，如陳曉明和陳思和，放入「新保守主義」這個大而無當的旗號下面，其實等於取消了概括的意義。海外學人看中國本土的文化實踐活動，容易產生理論概括的衝動，卻缺少設身處地的同情，只能是霧裏看花，不清不楚。

羅崗 上海
94.4.18

現代性與後現代性是爭論焦點

饒有興致地讀完今年2月號上的兩篇「二十一世紀評論」及4月號上的回應。我以為這個回合把我們帶到了眼下知識界十分熱鬧的有關「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爭議的前沿，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始於80年代的歐美學界對該問題的討論的延續。

如果說趙(毅衡)、徐(賁)二文基本上是站在現代性—普遍性的立場上對當前大陸「後現代主義」批評理論進行了評論，那麼張(頤武)文則是在「後現代主義」的理論立場上對有關現代性—普遍性的「偉大敘事」進行了一次反擊。我認為張文在批評趙、徐二文「對西方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強烈認同」這一點上頗有力度，而在回應他們「對中國大陸的特殊的政治生活與意識形態急切而激烈的抨擊」問題上卻避重就輕、語焉不詳。事實上針對趙、徐二文提出的問題，張文在這一點上的回應可以說是

迂迴的逃避，而不是實質意義上的應戰。

爭議的焦點是——借用哈貝馬斯的話說——現代性究竟是一項業已完成的方案抑或現代性已完全失敗了？而我懷疑這樣的爭議會有甚麼結果。任何理論話語都是對世界的一些分節，可討論的不是以甚麼標準來分節，而是任何分節體系背後的情境邏輯(包括權力關係)。這樣說似乎傾向權力—話語理論以及由此引發的所有等級話語(如「第三世界」)和霸權理論，然而，我寧願相信在權力與話語之間還存在着一個緩衝地帶，否則這個世界將變成十足的「動物莊園」。

沈語冰 杭州
95.5.12

何以譯為「生活在別處」？

貴刊總第28期朱學勤先生〈城頭變幻二王旗〉開頭一段，果然有「兀然插立」之感。盧梭的話的確很多，我讀得卻很少，記住的則更少，真不知這“Toujours hors de lui”出自何處。朱先生譯作「生活在別處」，更使我生出搜尋的興趣，惜乎未果。按說這個短語只能有「盛怒」、「發狂」一類的意義，不知朱先生緣何那般譯。只因譯作「生活在別處」與下文關係至巨，故極盼朱先生有以教我。

讀者 北京
95.5.10